

——基辛格回忆录

动乱年代



动乱年代

—基辛格回忆录

第一册

〔美〕亨利·基辛格 著

张志明 邱应觉 过家鼎
张幼云 朱振国 戴树乔 译
沈寿源 黄钟青 尤 颀

世界知识出版社



本书作者亨利·基辛格博士。



一九七三年九月基辛格宣誓就职后的第一天在国务院办公厅里。



基辛格和尼克松在一起。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一线希望	5
第二章 河内之行	13
第三章 中国：又前进了一步	57
第四章 即将爆发的水门事件	92
第五章 欧洲年	165
第六章 动乱中的中东	245
第七章 缓和：从扎维多沃到圣克利门蒂	286
第八章 印度支那：一叶知秋	384
第九章 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倒台	479
第十章 担任国务卿	534

前 言

各种情况的奇特结合，使得我在理查德·尼克松的第二届任期——本世纪内空前动乱的时期——内被委任处理我国外交政策的日常事务。一位刚刚赢得我国选举史上第二大胜利的总统，被他自己的行动所引起的、而他的作为又无法平息的巨大变革赶下了台。在尼克松总统的权力土崩瓦解的过程中，中东爆发了战争，我们与盟友发生了争执，能源产生了危机，越南问题的解决有了头绪，国内对美苏关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尼克松第二届任期伊始，我们曾想象即将跨进国际事务中一个创造性的新时代；外交政策中同时有如此多可有作为的情况，在以往即使有，也很罕见。但不到几个月的功夫，我们就面临国内权力崩溃的梦魇，以及为了防止外国敌手把此变成向我国的安全和各自由国家人民的安全进击的殊死斗争。

尼克松的第一届任期（一九六九——一九七三）——这是我前一卷回忆录《白宫岁月》所涉及的题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青春期。在印度支那的动乱中，尼克松政府能够控制事态的发展，使超级大国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结构。第二届任期内的外交——这在一九七四年夏末突然终止——已大致趋向成熟。尽管全世界没有让民主国家的领袖和保护人美国从其职责中得到喘息的时间，但是，已被削弱的政府权力却扩大了每一课题的困难。

水门事件对外交政策的几乎各个方面都有严重的影响。如果需要什么借鉴的话，它就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教训：对于制订和执行创造性外交政策来说，有一位强有力的总统是多么至关重要。然

而，在整个水门事件中，我们设法维护了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甚至还取得了某些重要成就。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期间和以后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促成了和平进程，这一进程有很大的进展，也有某些挫折，直至今日还在继续。我们还为控制能源危机奠定了基础。这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受考验的时期，但是政治家们没有权利要求只在寻常的时期供职。

在本卷所涉及的年代里，我自己的看法有了改变，而这不仅仅是由于我们国内的动乱。我在尼克松的第一届任期的四年半时间内担当了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后，于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成为国务卿。作为国家安全顾问，可以舒舒服服地选择那些似乎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作为国务卿，我所负责的问题的范围就广泛得多了。最重要的是，要由我来尽可能地把外交政策同国内的灾难彻底分开。这一作用，是出于必须，出于表面上求生存的民族本能，在许多方面得到了两党一致意见（这种一致意见为美国政府的国际行为制造了几乎是另外一种受保护的政治进程）的支持。

在描述尼克松垮台阶段的外交政策时，回忆录作者的任务就比通常的更为复杂。有关动机和心情等等无形的东西比之前一阶段来说更加难以捉摸。我所写下来的东西势必反映了我自己的有利地位，叙述了我的看法和信念，而这些还得与其他人的想法和感觉、与我的研究人员和我无法利用的文件——其中有许多在外交档案中——届时能对明白显示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有什么帮助结合起来去评判。我打算留下本卷著作的一册注释本以及我的文稿，供那些有朝一日希望对这一阶段作更加详细探讨的学者之用。这部回忆录描述了制订决策的一位参与者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我已作了巨大的——而且我希望还是认真的——努力来用文件证明我的主张。

我很感激国务卿、中央情报局长、负责政策的副国防部长、负

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助理以及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检查和清理分类资料(包括引文)的工作中给予了合作。他们要求作的修改都作了。尼克松总统也亲切地同意从他的总统档案中引用某些材料。

我十分感谢自从在政府中共事时起就一直支持我的同事们，没有他们的技能和贡献，这部著作永远也不可能完成。彼德·W·罗德曼，我十多年来的朋友、知交和同事，作为编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的有见识的指点是非常宝贵的。威廉·G·海兰以其对西欧和苏联事务的研究和深刻见解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罗斯玛丽·尼赫尔·尼赫斯对于中东问题和能源危机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她在一大堆材料中进行去粗取精的工作，她技术熟练、肯动脑筋、孜孜不倦。玛丽·E·布劳内尔在深入研究智利问题、水门事件和华盛顿能源会议等一系列题目时充分展现了她的知识、判断力和耐心。

威廉·D·罗杰斯和温斯顿·洛德出于诚挚的友谊，阅读了全部底稿并对底稿提出了许多建议。哈罗德·埃文斯是位了不起的编辑。他以对文章结构的锐利眼光，对累赘的部分加以剔除和斧正。读过部分底稿并提出了有益建议的还有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伦纳德·加门特、戴维·金斯伯格、约翰·弗里曼、艾伦·格林斯潘、彼得·格伦维尔和黛安·索耶。

我的私人助理克里斯廷·维克是上述所有事务的总管和协调人。她的才能绝非只是能看懂我的手迹，她还负责底稿的打字。克里斯对本书写作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很关心，在有关的女工作人员中起了主导作用，使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她总是很乐观，一句话，她是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在需要打字的时候，黛安·廷克、莫伊拉·道森、卡西·布坎南、琳达·科莫尼克和克里斯蒂·贝斯特都给予有效的援助。

作者从出版商那里得到的最好帮助，莫过于利特尔和布朗。我感谢吉纳维夫·扬就编写工作所提出的有见解（和不懈）的忠告，感谢贝特西·皮撒的校订才华。迪克·桑德森绘制了极佳的地圖，梅利莎·克莱门斯为本书作了非常出色的索引。

我的机密文件存放在国会图书馆。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感谢国会图书馆管理员丹尼尔·J·布尔斯廷和文稿处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的好意和协助，其中有：处长保罗·T·赫夫龙博士、职员约翰·诺尔顿、理查德·比克尔、约瑟夫·沙利文、格罗弗·巴茨、玛丽·玛格丽特·沃尔弗斯基尔和迈克尔·J·麦克尔德里。

我还需感谢（虽然迟了一点）哈里·朱布柯夫，他在空军部工作时所做的新闻简报和分析多年来对美国政府工作人员有着巨大的价值，在准备《白宫岁月》和本卷著作的过程中，对于我的工作人的研究工作给予了非常宝贵的帮助。

我把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南希，她赋予我的生命以新的意义。

正如我对本书所描述的行动负责一样，本书的内容由我一人负责。

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第一章

一线希望

游泳池里的决定

一九七三年八月，加利福尼亚天气晴朗。每天清晨，我丢下公文，坐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我办公室后面的平台上，遥望着朝阳冲开洋面上的薄雾。偶尔地，我看到一个瘦小的、肩头有点佝偻的身影踟蹰在峭壁的边缘。峭壁的那一边便是海滩和太平洋。在这宁静的环境中，理查德·尼克松正在忍受着他政治生涯中漫长的最后折磨。除了与世隔绝的圣克利门蒂之外，全国都在风传着他是否能继续担任总统的猜测。尼克松本人似乎沉着、镇静。他很少谈到水门事件——从来不明确谈论。只有非常了解尼克松的人才能从他神思恍惚和闷闷不乐的神态中看出他内心深处的剧烈不安。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给我打电话，询问我的两个孩子伊丽莎白和戴维是否想去尼克松官邸的游泳池游泳。他们确实要去。稍后，她又打来电话，邀请我一起去游泳。我拎起游泳衣箱，从我的办公室徒步穿过直升飞机起落场，来到尼克松家的住区“太平之家”，这是一幢宁谧恬静的西班牙式别墅，由嵯峨的柏树和一堵白色高墙同工作人员的院子隔开。迎接我的是尼克松的男仆马诺洛·桑切斯。古谚说，仆人眼里无英雄，可是他

对自己的主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一会儿，尼克松也来到游泳池同我和我的孩子们一起游泳。稍后，他提议到浅水区去谈一谈他定于第二天上午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我的主子在水边同我讨论重要事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一九七〇年四月，他就是在戴维营的游泳池里一边游泳（我在池边漫步），一边把他下令美国军队进入柬埔寨庇护地的最后决定告诉了我。

我坐在游泳池的台阶上；美国总统仰面漂浮在水面上。我们平平淡淡地回顾了他就外交政策问题所作的某些答复。突然，他既不热情也不激动地说：“我将在记者招待会一开始宣布任命你为国务卿。”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谈起这件事。

当然，这并非我第一次听到此事。水门事件已使白宫助理们迄今为止的显要地位难以保住。我在政府其他人员中的影响取决于总统的权威，而总统的权威正随着各种庸俗行为（某些是无聊的，某些是非法的）被不断揭露而江河日下。五月份被召回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的亚历山大·黑格早在夏初就曾对我说过，除了任命我为国务卿之外，别无其他解决办法。当时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预定在夏末无论如何要离职。黑格经常向我通报他与尼克松就此问题的曲折磋商情况；这些磋商是不容易的。对于尼克松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因为这表明——也许比有关水门事件的任何大字标题都更加强烈地表明——他遭到了多么严重的创伤。他从来就不想有一位强有力的国务卿；他在一九六八年的竞选中就曾断言，外交政策将由白宫来处理。后来果真如此。假如他准备改变这一原则，这表明他已是多么软弱了。

我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我希望我毫不辜负他对我的信任。这是一种陈腐的老生常谈，旨在维护似乎他给了我极大恩惠的假象。其实，尼克松和我都知道，舍此别无其他选择。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了副国务卿肯尼思·拉什的电话。他向

我表示祝贺，并保证全力支持国务院。这是一种气度宽大的姿态，尤其是因为拉什无疑知道，若不是因为水门事件，接替比尔·罗杰斯之职务的应是他，而不是我。^①罗杰斯也打电话来表示祝贺；我们作了客气而简短的交谈。然后我就坐下来观看记者招待会的电视实况转播。

尼克松正要开口说话时，我的好友、聪慧漂亮的挪威女演员莉夫·乌尔曼从奥斯陆打来了电话，所谈之事我已忘却。我拿起话筒解释当时我不能与她讲话的原因。我说总统正在电视上发表一个重要公告。由于我不好意思告诉她是什么内容，我需要再补充解释一句。我刚刚挂上电话，尼克松宣布我任国务卿的简短讲话也结束了。在以热情和慷慨的言辞宣布罗杰斯辞职以后，尼克松提名我接替他的职务，并说，“我认为，基辛格博士担任这一职务的资格是诸位女士们和先生们以及在电视和电台上看着我们（原文如此）、听着我们的那些人们众所周知的。”他没有详谈我的资格是什么。就这样，在我挂电话的时候，我碰巧没有听到自己被提名为国务卿的讲话。

尼克松的记者招待会的其余时间都花在有关水门事件的讯问上。与此同时，恭贺的电话象潮水一般向我的办公室涌来。我接电话的感情是复杂的。本来可以叫人高兴的时刻却充满了深切的忧虑，因为人们从记者招待会上看出，本届政府遭到的围攻有何等严重。我们正在不遗余力地防止美国的外交政策随着尼克松总统的权力及其所有的行政权力的逐渐瓦解而分崩离析。我得到了一个我从来想象不到的职务；然而我却没有闲情逸致来庆贺这件事。我无法驱散萦绕在我心头的痛切之感；正当我飞黄腾达之时，就在几码之外，理查德·尼克松却如此孤单和备受折磨，在那冷若冰霜的外表下，还有一种恐惧之感。

丧失时机

一切都与我们在一九七三年早些时候的期望大不相同。这一年开始时充满了光辉的希望；一届总统任期开始就展现了如此灿烂的外交政策前景，这还是少见的。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年来的国内尖锐分裂看来将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而终止。前一年十一月尼克松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已给他提供了一次不寻常的机会来向所有善意的男男女女伸出手来，并医治国家的创伤。关于越南战争的辩论依然存在怀疑，但是其主要角色部分已被这场苦难的经历耗尽了精力，部分被一个新世界（此时关于十年的口号已失去其意义）弄糊涂了。我们希望，反战的批评家们迟早会在战争的结束中得到安慰，尽管他们还会继续对所使用的策略提出异议。而那些支持过我们的人则可以从民族牺牲维护了民族荣誉这一事实中感到自豪。尼克松本人可能会预感到一切成就都是短命的而忧心忡忡；他经得起终生灾难的折磨。实际上，他面临的反对并不重大；他毕竟赢得了美国除一个州之外的每一个州。有可能希望，过去十年的剧烈痛苦会给予各方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训，即：一个社会成为伟大的社会，不是靠各派互相制胜对方，而是靠调和。

也许我们想得太好了，但我们深信，美国面前有着展开创造性外交政策的难得机会。我们终于可以使团结一致的人民投身于因忙于印度支那事务而使我们未能从事的任务。领导人的一般命运是继承某种自有其规律、难以处置的问题或义务——越南战争就打击了尼克松的第一届任期。现在国际关系中的许多因素一下子似乎都同时有助于展开创造性的外交了：

①在同我们的盟友，同北大西洋联盟的各工业民主化国家和

日本的关系中，尼克松在其第一届任期内结束了与法国的野蛮争吵，维护了我国军队在欧洲的义务免遭来自国会的攻击，并且在美国向其共产主义对手作出新的首创精神所引起的表面上的“震惊”中维持了盟友间的联系。欧洲和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又引起了重申民主国家的共同前途和共同价值的新的首创精神。

◎在尼克松的第一届任期内，我们同两个共产党巨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改善了关系。鉴于它们之间存在的互不信任和恐惧使它们在思想意识方面对我们的敌意难以具体化；任何一方对我们的挑战都不能走得太远，否则就会把我们推向他自己的死敌一边。美国摆脱了越南战争之后，能够抵制威胁国际秩序的侵略行径。尼克松有强大的支持作后盾，有可能进行基本范围内的谈判。

◎在中东，埃及正开始摆脱苏联。美国坚持不渝的外交战略促进了这一事态的发展，这给和平外交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前景。

◎有了解决越南战争的声望和改善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之后，尼克松政府便可以满怀信心地转向第三世界。我们确立了对待拉丁美洲的新态度，并打算把此当作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新格局的出发点。

至于我，一九七三年伊始，就因同尼克松第一届任期内的种种斗争没有什么瓜葛而感到特别超脱。官僚主义的压力和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构成了华盛顿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对于我来说，它们已失去了许多意义，因为我已决定于当年年底辞职。

我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这样做了，因为我看到了外交政策的新阶段，不再被蒙上一场分裂斗争的阴影，同时还相信，尼克松总统第一届任期的那种拜占庭式的行政程序非结束不可。权力不应再集中于撇开政府其他成员秘密办事的总统助理手中。我的朋友、可敬和聪慧的戴维·布鲁斯争辩说，如果我当真要使我们的成

就永不磨灭的话，我应当准备把发扬成就的任务托给别人。如果我们做得一丝不苟的话，国家的外交政策就得制度化。如果要留传一点东西而不是仅仅露一手绝招，我们就得委于国务院和外事部门的常务官员以更大的职责。布鲁斯不太客气地提出，只要我从我的白宫办公室里决定一切，那么这一点就做不到。

我勉强地同意了他的意见。当然，还有不那么高尚的理由可以从原则上加强这个论点。一九七一年我秘密的中国之行破坏了我先前不抛头露面的状况，使批评尼克松的人有可能以赞扬我的成就来贬低尼克松的成就。我虽然没有有意识地去鼓励这个过程，但是我也没有加以抵制。从此以后，白宫不失时机地降低我的威望：在印一巴危机中、在导致一九七二年莫斯科首脑会议的工作中、以及在越南和平谈判的最后阶段^②都是如此。

尼克松并没有错；我的名气大得已经超出了国家安全顾问的职务。复杂的总统决策体系绕开正规的官僚机构，假如这样一种体系无论如何可以再维持四年的话（对此我表示怀疑），总统与助理之间的无形关系已经磨损得使我不可能再在这个体系的中枢发挥多长时间的作用了。

此外，国家安全小组已经重新组合，在新成员试图建立他们各自的地位时，我可没有心思再投入一轮争权夺利的斗争了。不倒翁国防部长梅尔文·R·莱尔德已表示希望早在一九七二年的选举之前就离职。在新的一年里，他由善于思考问题的埃利奥特·理查森取代。在理查森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担任副国务卿时，我同他合作得很好。尼克松在选举中获胜以后，便任命理查德·赫尔姆斯为驻伊朗大使，实现了要撤销他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的长期打算。赫尔姆斯的接班人是詹姆斯·R·施莱辛格。施莱辛格在预算局的管理才能以及他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时处理一起核试验争执的勇气引起了尼克松的注意。在这次全面清洗

中，罗杰斯国务卿得以幸免。那仅仅是由于他已要求选择另一个时机离开国务院，以此表明，他的离开是他自己的抉择，而非大批改组的一部分。他的要求得到了允许，但尼克松打算在那年夏天用新副国务卿肯尼思·拉什来代替他。

几年之前，在某次官场斗争的高潮中或其他场合，我曾对当时的总统讲话稿撰写人威廉·萨菲尔说过，我的胜利必然是暂时的、脆弱的。若要继续发挥我的影响的话，我就得在官场的每一场斗争中取胜；而要摧毁我的权威的话，某个内阁成员只需有一次成功就够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风险是不可能逾越的。^③事实上，在整整一届总统的任期内，我都回避了这种风险，但是，把命运同一批能干的、心理上无经验的新人拴在一起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打算在一九七三年再任职一段时间，直至看到印度支那实现和平，对工业民主国家提出新的倡议（后来这一年被称之为“欧洲年”），以及巩固新的莫斯科—华盛顿—北京三角关系。我已同几位密友初步谈了离职后的事业：也许在牛津万灵学院当一名会员。南希·马吉尼斯刚刚同意做我的妻子，尽管我们的计划后来被不久就降临于我们头上的危机而一再耽误了。

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实际上是否能实现我的意图，或者一心忙于处理事务而推迟我的辞职。我也不能证实我们对于充满希望的未来的远见是否能实现。对于“也许可能的事”乱加猜测是徒劳的。我们的一切打算不久就被水门事件的灭顶之灾淹没了。

但是，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就在尼克松宣誓就任第二届总统四天以后，我仍是带着这种高兴和宽慰的心情穿过了白宫与旧行政办公大楼之间的狭窄街道，就新签署的越南协议向记者吹风。在逐段讲解了协议之后，我以呼吁全国和好的强烈心情结束我的讲话：

总统昨天说，我们得保持警惕，我们一定会保持警惕的，但是我们还要作出积极的努力。就我们国内的情况来看，现在应当清楚了，没有任何人在这场国内战争中独自感到极度的痛苦，也没有任何人在这些辩论中垄断道义上的远见。现在我们终于达成了一项协议，美国没有在协议中为其盟友规定政治前途，这项协议应能维护各方的尊严和自尊心。我们一起医治了印度支那的创伤，我们可以开始医治美国国内的创伤了。

一位西班牙诗人曾经写道：“旅客，道路是没有的，路是走出来的。”在那转瞬即逝的、单纯无知的时刻——这与尼克松政府的特性是极不相称的——我们满怀信心，在尼克松的第二届任期内，遨游我们的希望之路，我们将走出一条通向更加美好未来的路。

① 见H·R·霍尔德曼和约瑟夫·戴蒙纳著：《权力的终结》（纽约：纽约时报丛书，一九七八年版），第一七五——一八〇页。同时见本书第十章。

② 见《白宫岁月》（英文版——下同）第九一七——九一八页、一一八五——一一八六页、一四五五——一四六五页。威廉·萨菲尔在《垮台之前：水门事件前的白宫内幕》一书中微妙地描写了白宫处理其“基辛格问题”的方式（纽约花园城：道布尔戴公司，一九七六年版），第三部第五章。

③ 萨菲尔著：《垮台之前》，第一七〇页。